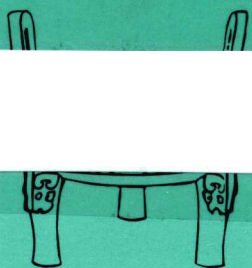


诸子现代版丛书

方勇 主编

吕氏春秋

刘生良
评注



诸子现代版丛书

方勇
主编

吕氏春秋

刘生良
评注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刘生良评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诸子现代版丛书)

ISBN 978-7-100-10553-8

I. ①吕… II. ①刘…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
译文③《吕氏春秋》—注释 IV. ①B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9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诸子现代版丛书

吕氏春秋

刘生良 评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553-8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 1/4

定价: 69.00 元

诸子现代版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

钟肇鹏 卿希泰 傅璇琮

主 编 方 勇

总序

方勇

春秋战国之际，王道衰微，诸侯异政，礼乐崩坏，事不稽古。其间诸子，究际天人，异说郁起。老庄述道，孔孟言礼，墨翟执俭，申韩持法，其余诸家，亦各申己见，激辩争鸣。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计，诸子之学，勃然而兴，诚为中华文明之活水源头。

自汉武改运，百家罢黜，儒术独尊，然子学一脉，承传绵延，代有兴发，不绝如缕。清末民初，旧政易制，西学东渐，儒学独尊地位不再。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吕思勉、冯友兰、于省吾、严灵峰诸君，各奋勤智，推究诸子，彰明百家，子学重现繁荣之貌。方今之世，政通人和，文运昭回。学界同仁，秉承诸子精神，整理诸子文献，述道言治，持说论辩，子学全面复兴之势，不可遏抑。

子学之全面复兴，其要有四：一曰整理文献；二曰精研学术；三曰传承精神；四曰推广文化。四要之中，整理文献奠其根基，精研学术掌其主干，传承精神运其枢纽，推广文化辅其侧翼。夫四要者，方今学者所推重者也。学界群贤，或专治一要，或数要并攻，各逞高论，共襄复兴之盛事。《诸子集成》《无求备斋诸子集成》《子藏》等子学文献整理丛书相继刊行，子学文献之整理愈发扎实厚重。《诸子学刊》《管子学刊》《老子学刊》《孔子学刊》《诸子研究丛书》等子学研究丛刊、丛书亦渐次问世，持续推动子学研究向纵深

发展。合而观之,当代子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均有长足进步。然子学精神之提炼传承、子学文化之普及推广尚显薄弱。子学精神者,曰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互相争鸣,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之精神也。子学精神贯穿历代子学发展之始终,实为诸子学说流衍之内在动力,乃子学承传延续之真脉。新时代之子学,当以承传发扬子学精神为己任,推陈出新,彰显当代子学之风标。再言子学文化之推广:诸子持论迥异,流派分明,各有传授,加之世事时局之影响,虽源远流长,却多持于士大夫、文人学者之手,并未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则诸子之学,本非束之高阁、囿于书斋之案头学术,而实为导世化俗、作用当下之实学。子学研究若清谈理论,不能化为时用,纵汪洋恣肆,亦难免于空疏之责。是故当代之诸子学术,务期以昌明国法,启蒙民智,摧邪辅正,去伪存真。故曰推广子学文化为子学复兴之辅翼,不可或缺。唯有深度与广度之二维拓展,方可引领子学之全面繁荣。

方今时代,与先秦相类,文化多元,议论蜂起,传统与革新同在,危机与机遇并存。固守传统、推尊一家,已难以独擅学林。传统文化、学术之转型,势在必行。由是,根植传统文化沃土而离脱旧学窠臼、融通中西思想方法而延续民族真脉之“新子学”应运而生。“新子学”之时代任务有三:一曰提炼并弘扬子学精神。以子学精神为导引,方可重拾独立、自由、平等、共生之优良传统,进而消解旧学专制、偏激、排异之流弊,从而锻造当代多元、会通之学术、文化。二曰重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五四”之际,旧学统治崩坍,除旧立新之声四起,加之西学涌入推助波澜,新文化运动席卷

中华大地,是故中国传统学术承传递嬗之脉络暂告中断。学界多依傍西学体系,以期重构中华学术。《诗》归文,《春秋》入史,《论》《孟》归哲。就其形式而言,可谓大致实现传统到现代之转型。得益于此,中华学术亦得以挣脱桎梏,获得长足之进步。然就其实质而论,中学之血脉未能全合西学之骨络,使现今学术,表里不一,精神尽失,不能与西学平等对话,于世界范围几近失语。揆诸当今形势,中华文化之复兴,既要植根于传统,又须着眼于世界。其话语体系之重构,迫在眉睫。诸子之学,凝聚先人智慧哲思,为中华文化学术之源头,民族话语系统之柱石。“新子学”脱胎于传统子学,兼有融通中西之思想、契合当前再造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要求,当成为革新学术、重塑精神之中坚。三曰全面复兴子学,引领当代之国学。先秦之际,百家之说虽隐显各异,实则无高下之判。汉武推孔氏,黜百家,遂有经子之分野。传统国学,以经学为主导,因循守旧,排斥异端,以致抱残守缺,丧失创造革新之能力。“新子学”力主退经还子,全面复兴诸家之学,由此构建兼容经儒,并包诸子之开放体系,缔造包罗万有、生生不息之崭新学术,引领当代国学之发展走向。近两年间,学界先后数次召开高端学术研讨会,问脉“新子学”,有关“新子学”之议论亦持续升温。讨论日趋深入,“新子学”亦渐入人心,其理念、体系、方向已获学界多数朋友认同。“新子学”已崛起为当代主流学术之一。革新传统子学,缔造全新学术亦由此成为当前子学发展之风向标。恰值此时,商务印书馆欲刊行《诸子现代版丛书》,此举无疑顺应时代之要求,符合子学发展之规律,与“新子学”之理念不谋而合,实为复兴诸子之学、弘扬百家文化之新鲜血液。

20 世纪以来,子学著作之整理成果颇丰。《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诸子集成续编》《诸子集成补编》《无求备斋诸子集成》等大型丛书先后推出。《子藏》前两批成果之面世将子书整理推上另一高峰。《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亦选入部分子书,另有某子之注译、选译单行本等等。就当前成果而言,《子藏》等大型丛书固然体系宏阔、内容丰赡,然其以整理元典为要,以保留子书原貌为先,文献价值虽高,却因语言古奥不利于大众之接受。今人之注译、选译,化繁为简,变古为今,易传播于当今,然各成一家,不成体系,标准不一,良莠不齐,恐有泥沙俱下、以讹传讹之虞。由是看来,《诸子现代版丛书》之出版,顺时应势,甚为必要。该丛书精选诸子百家之善本,全面注译原文。子书以刘勰所谓“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也”为标准择选,即诸子为诸子百家之子,而非经史子集之子。诸子之涵盖范围循章炳麟《诸子略说》之言,即“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另,篇首设题解,篇尾设评析,前后呼应,解读通篇大意,论析主要观点,导引读者接受。丛书全注全译,博采众长,简明晓畅,务求变古奥为浅近,化艰深为平易。题解、评析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力争符合史实,通达精到。《诸子现代版丛书》之编成,文献价值与可推广性兼而有之,对当代子学之复兴与繁荣必有强劲之推动作用。

《诸子现代版丛书》之编撰宗旨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该丛书就文献价值而言,择选版本精善,体系构建谨严,持论平允适当,与《子藏》等诸子丛书相类,当成传世之经典。就其学术价值而言,立足于经典传承,着眼于文化普及,揭百家之面纱于众生,显诸子之精神于当世,使诸子当下之学之本质得以回

归,大利于子学之普及与推广,无疑契合子学全面复兴之要义。就其现实意义而论,创新学术,彰显时代之风标,有益于大众对民族文化之认同,亦有益于提升华夏文明之世界影响与地位,从而助力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重构。《诸子现代版丛书》之面世,得益于学界整理诸子文献,创新百家学术之长期积淀,《诸子集成》系列丛书、《子藏》《诸子研究丛书》、“新子学”等均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诸子现代版丛书》之成书,亦是子学转型发展之必然,从传统到现代,自菁英及大众,由封闭而融通,预示着当今子学发展已步入“新子学”阶段,子学之全面复兴,势在必然。

一人之立,尚需精神;一国之立,何能无精神而自行?耽于功利,惑于途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所谓中国者竟何谓乎?诸子百家之学,源远流长,承传绵延两千余年而不减其泽,实为中华文化与精神之活水源头。当今中国之崛起,民族之复兴,实应以精神之回归、文化之传承为保证。归根返本,正本清源,正待其时。当代诸子之学,当汇纳百家以成不朽,淘沙取金以锻精神,引领文化、学术之走向,助推民族、文化复兴之实现。《诸子现代版丛书》为当代诸子学之力作,必将于未来之学术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就一代之经典。

2014年9月15日

导 言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历史大潮推出的一部殿后大作,名叫《吕氏春秋》。这部大作“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①，“采精录异，成一家言”^②，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精博；又以“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计一百六十篇的巨幅次第展开，体系完备，编排整齐，结构合理，组织严密，体制形式亦异常宏伟新美。而且其出场和发布方式也极为奇特，主编者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③，以这种方式广告天下，闪亮登场，当然格外震人耳目，一举轰动四方，更充分显示了主编者无与伦比的气魄、胸怀、雄心和自信。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典籍，对于这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自应给予高度的重视，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伟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下面笔者拟在相关记载和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吕氏春秋》的基本问题略作介绍和阐说，为广大读者的学习和研究导夫先路。

①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页。

② 宋高似孙《子略》卷四，上海中华书局据《学津讨原》本校刊，1936年版。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一、《吕氏春秋》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写作背景

据《史记》《汉书》等书记载,《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写的。尽管它不是吕不韦一人独立撰写的专著,但在总体策划、纲目要点、发凡起例及整合编辑等方面,显然少不了吕氏亲自操作的辛劳,也不能排除其中一些篇章出自吕不韦手笔的可能,而且全书各篇即使大多出自门客之手,也必然体现了吕不韦的意图和思想,反映了吕不韦的才略和抱负。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尤其是根据古人著述的惯例,书名既然冠以“吕氏”,那么吕不韦就应是该书无可争议的主编和主要作者。

关于吕不韦的生平,《战国策·秦策五》和《史记·吕不韦列传》等文献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只是在某些细节上略有出入,兹整合综括作一简介。吕不韦(?—前235),原籍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早年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商。后来他在赵都邯郸做生意时,遇见为质于赵、困厄失意的秦公子异人,以为是“奇货可居”,于是转而从事政治投机。他主动交往,先以五百金资助异人,令其广结宾客,以提高声望地位;复以五百金购买奇物玩好西游于秦,献给秦太子安国君所宠幸而无子的华阳夫人,极力为异人游说,使得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嗣,改名子楚,“请吕不韦傅之”。他还将与己同居已有身孕的舞女赵姬献给子楚,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数年后,秦昭襄王卒,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一年后,孝文王卒,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

封文信侯,初食“蓝田十二县”,后改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而终,十三岁的太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使之主掌朝政。吕不韦先后在庄襄王、秦王政两朝为相十三年,一方面罗致人才,兴修水利,发展工商;一方面率军征战,消灭东周,蚕食诸侯,使秦国的实力大大增强,疆土也大大扩展,为其最终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他又广招宾客,容纳各家,网罗图籍,主持编写出《吕氏春秋》这一巨著,为秦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秦统一天下及其日后的治理天下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理论基础。可以说,吕不韦内外经营,文治武功,在各个方面都为秦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吕不韦的某些主张和做法与秦王政颇有分歧,吕不韦的专权也越来越为秦王政所不满,矛盾日益加深。秦王政十年十月,亲政仅一年多的嬴政便以吕不韦与嫪毐之乱有牵连的名义,罢免了吕的相国职务,令其出居封地河南洛阳。两年后,又令其迁蜀。吕不韦见大势已去,末日来临,“恐诛,乃饮鸩而死”,死后葬于洛阳北邙道西。

从吕不韦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既是一位头脑精明、反应机敏、善于捕捉商机、很会做生意,而且很有政治远见的大商人,又是一位工于心计、胸怀大志、思想开放、处事果断,具有非凡智慧、胆略、才能且干出了一番事业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热心文事、很有思想,能著书立名遗传后世,在学术文化上有很大作为的文化人,绝非一般唯利是图、只顾发财致富的商贾和以攫取权势、位极人臣为满足的政客权要可比。他是商人出身的政要,政要身份的文士,集商人、政要、文士的性格、气质、才干于一身,是时势所

造又创造时势的一位奇才。有人曾说吕不韦“不学无术”，在学问上不足称道^①，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秦会要》称“不韦好经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其“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吕不韦列传》等又载其曾长期担任子楚的师傅，这足以说明吕氏博学多闻，学有根柢。吕书的《序意》公认是不韦所撰，更可确证其学识和水平之高。由此可见，吕氏的学问和文才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就吕不韦与吕书的关系而言，我们虽不能完全排除其以权要充任主编并开此先例之嫌疑，但无论如何，他和后世的淮南王刘安一样，是完全有能力作为吕书的主编和主要作者的，其作用也决非当今挂名风潮中某些著作的所谓“主编”可以相比。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该书《序意》篇有较确切的记载。其文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东汉高诱认为“维秦八年”是指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即公元前 239 年；清人孙星衍根据“涒滩”为“太岁在申”之名，考订为秦灭东周后的第八年，即秦王政六年，公元前 241 年。对此，当然应以后者为确^②。这就使《吕氏春秋》成为先秦典籍中唯一一部可以确切知道写作年代的书籍。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曾两次提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有人据此认为，“维秦八年”只是“十二纪”的成书时间，

① 如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见《饮冰室合集》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② 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学报》1979 年第 5 期；又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85 页。

至于“八览”等,应是不韦迁蜀后所作。如陈奇猷先生就说过:“据我分析,‘十二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他还认为,《序意》殿于“十二纪”之后就是一个证明,说明《序意》只序十二纪,不包括览、论,不韦迁蜀后著的是览、论,而非《吕氏春秋》全书^①。对此说法,笔者颇不赞同。且不说不韦迁蜀是否成行颇有争议,从迁蜀到饮鸩自尽时间很短,根本不可能著书,正如明人方孝孺在《读吕氏春秋》中所说的,此时“有何宾客,何暇著哉?”又安得如史传所云“悬书于咸阳”?更何况太史公明明白白说的是“世传《吕览》”,传者,乃流传、传播之义,绝不是著、作的意思;《吕览》,系《吕氏春秋》的简称或别名,绝不是仅指“八览”而言,太史公不说《吕氏春秋》而称《吕览》,分明是为了行文的方便。陈奇猷先生等显然是有所疏忽而误解了司马迁的说法。再者,《序意》显系残篇,后人盖因此而将其由书末移置于“十二纪”之后,并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十二纪”“八览”“六论”都是《吕氏春秋》一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可能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地单独流行于世。因此,司马迁“不韦迁蜀”之说法,并不影响吕书成书于“维秦八年”的结论,二者之间并无矛盾。综合观之,或许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吕氏春秋》初稿完成于“秦八年”,其后或略有增补修订,至其因迁蜀而死后乃以定稿正式流传于世。然而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关于“发愤著书”一段言论,出于论证观点的需要,对史实多

① 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又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7—1888页。

有调整,如“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其所著实在“失明”“膑脚”之先。在笔者看来,其“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更当如是看待,似应理解为不韦因“世传《吕览》”而“迁蜀”才对。静言思之,无论如何,《吕氏春秋》只能是在吕不韦执政鼎盛时期的“秦八年”一次性基本完成才合理可信。

关于《吕氏春秋》的写作背景,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也有所交代。他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餘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争强斗胜而招士,又为了仿效荀卿之徒在文化上给秦国争荣并压倒诸侯而使门客编著此书布天下,这只说对了一部分,而且太表层化了。其深层的背景和缘由,则在于自庄襄王即位之初吕不韦率军灭掉东周后,天子已绝,秦欲取而代之,其统一天下已是势在必得,同时,适应诸侯纷争之政治形势而兴起的百家争鸣已近尾声,并由对立开始趋向融合,在天下行将统一之际,身为秦相和“仲父”的吕不韦为了招致智略之士出谋划策以完成统一大业,才大规模地养士,又为了适应秦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和随之而来的统一意识形态和百家思想的需要,并且为秦统一天下和日后治理天下提供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纲领,为未来秦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千秋基业,同时也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或许还有实现其更大政治野心的企图),进而使自己享有万世功名,才组织门客编著《吕氏春秋》的。

总之,《吕氏春秋》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欲为即将诞生的大帝国立典立则,同时也出于吕氏追求功名的需要,欲为自己生前身后立功立言而产生的。前者决定后者,是第一位的,后者依赖前者,是第二位的。只可惜日渐长大的秦王政与吕不韦意见不合,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思想主张和治国方略,使其部分想法落空,而且最终以悲剧收场。

二、《吕氏春秋》的题意、性质、宗旨及学派定位

吕不韦把他主持编著的这部大型书籍命名为《吕氏春秋》,是颇有深意的。“春秋”一词,本是年、岁之意。古人认为春是萌发生长的季节,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春秋连称就代表一年或一岁。也许在远古时代只有春、秋两季,后来又从中分出夏、冬两季,才变成了一年四季。由于春秋可代表年岁,后人便把它引申为编年体史书的称谓。唐人刘知几曾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①。”太丁是商纣的祖父,或许在商代后期就以“春秋”作为历史书的名称了。到春秋时代,各国都将其官方史书称为“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墨子·明鬼》篇)。春秋末年,孔子根据鲁之《春秋》加以增删修订,编写出《春秋》一书,“春秋”又进一步成为该书所记时代的称谓。由于孔子编写的《春秋》文字极为简括,以“微

① 唐刘知几《史通》卷一《内篇·六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页。

言大义”著称,随后便出现了为《春秋》作传注的《左氏春秋》等,又进一步衍生出摆脱编年体史书之局限的《虞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以史为主、亦史亦子的专书。《吕氏春秋》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编写的又一部题名“春秋”的书,较之以前此类专书,更是一种创格。它既有沿袭继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赋予了“春秋”更多的新意。其一,它沿用了“春秋”表示年岁的本义,但既不按年纪事,也不记述某一特定年份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以十二月令的形式依次讲述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天象、物候,尤其是天子应做的政事和应注意的问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份天子的施政年历和活动年表,赋予了“春秋”以“年历”“年表”的新意。其二,它继承了“春秋”纪事叙史的传统,但不只记人事,而是将天、地、人结合起来全面记述和思考,不只写史事,而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凡过去(历史)、现在(现实)、未来(理想)之事全都叙写和讨论,从而赋予了“春秋”全方位的空间内涵和全维度的时间内涵。其三,它仿效孔子写《春秋》的做法,但彻底打破了其编年纪事的体例,放弃了其“微言大义”的笔法,采用以举例形式讲史事和充分说理的写法,注重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务求意旨显豁明快,这就赋予了“春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写作风格;更重要的,它还弘扬了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定天下”的旨趣和精神,与之一脉相承,但又与孔子向后看、梦想恢复旧秩序的做法截然相反,而是向前看、希望建立新秩序,这又改变了“春秋”固有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其四,它保持了“春秋”作为史书的某些特征,因而司马迁谓其“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将其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作为史书看待,